

俄国词典编纂的传统与新篇

郑述谱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就俄国词典编纂的历史与现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些方面进行了概要的描述。这些方面可以归纳如下: 可以算是悠久的词典编纂历史; 词汇语义研究的先行者; 率先创立词汇学学科; 坚守词典学理论; 词汇学与词典编纂带动了其他相关学科; 众多著名语言学家实际参与词典编纂; 致力于语言研究成果的词典化; 视规范性为语文词典的第一要旨; 积极务实地面对语言的新变化; 理性地坚持固有传统。

关键词: 俄国; 词典编纂; 传统; 新篇

中图分类号: H356

文献标识码: A

0 破题

本文旨在对俄国的词典编纂活动总体情况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方面, 加以纵览式的、综合性的描述。这里, 我们把俄国看作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 而对其不同历史时期, 包括十月革命前、前苏联以及苏联解体后, 不做严格的区分。因此, 文章标题里说的“俄国”, 实际上泛指不同历史时期的俄罗斯国家。这样做是有作者的考虑的。我们心目中面对的读者, 不是专攻俄语词典学的, 而仅仅是想一般了解与借鉴俄国的经验与做法的读者, 他们想知道的只是一个大概与亮点, 而未必是全部与细部。当然, 这样做可能引起非议。作为上层建筑的词典编纂活动, 岂能不受经济基础的影响? 怎能处于不同制度下的东西, 拿来混为一谈? 这话当然不错。不过, 转念一想,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统的东西, 不仅是一脉相承的, 历代相传的, 甚至也是根深蒂固的, 历久不衰的。既然是贯通式的纵览, 不考虑“断代”, 更关注因袭, 也应该是允许的。至于说“新篇”, 其着眼点主要在于与以往不同或前所未有之客观状况, 究竟孰是孰非, 至少暂时我们无意做主观评判。

1 可以算是悠久的词典编纂历史

俄国人经常说俄国是一个具有词典编纂传统的国家。这样说也许不无理由。据说, “俄国词典编纂肇始于 11 世纪。早期的俄语词典著作出现于文字发展初期, 是出于了解某个不明白的词的需要而产生的”, “最早的词典带有混合的性质。它们同时也是百科性的释疑手册”。¹ 如果考虑到, 基辅罗斯大约形成于 9 世纪, 对一个历史算不上悠久的国家来说, 这么早就有词典编纂活动, 相对说来, 这个历史可以算是悠久。

包括西方国家出版的语言学史著述, 都会提到一件轶事, 那就是德国著名的大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 (Leibniz) 曾建议俄国女皇叶卡杰琳娜二世做一个多种不同语言词汇的对比调查。后来, 由德裔学者帕拉斯 (Pallas P.) 牵头, 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 并提出了一个称作《全世界语言对比词汇》的调查报告, 其中有涉及到二百多种语言的比较词表。这件事是

在 1786-1789 年间完成的。²

莱布尼兹提出这个建议的初衷我们无法确切知晓，但又不难猜出个大概。首先，在欧洲人对印欧语以外的语言还很少了解的当时，这样一个多种语言词汇对比词表会成为了解人类语言概貌的便捷途径。他之所以偏偏向叶卡杰琳娜二世提出，除了后者本是德国人之外，一定是看中了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多种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对从事语言调查与研究来说，这是一笔宝贵的资源与财富。

2 词汇语义研究的先行者

上述轶事对后世俄国的学术研究是否产生过影响，我们无从断定。但是，对晚些时候的词汇研究，却有学者做出过明确的判断。前苏联的著名语言学家维诺格拉多夫（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在讲稿基础上写成的《俄国语言学史》一书中写道：“19 世纪下半叶，我国的语言学，在历史词汇学领域，是走在西欧语言学前面的。正是我国的学者，提出并以材料论证了词语意义变化规律的原则。”³

接下来，他举出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波铁布尼亚（Потебня А. А., 1835-1891）。他是俄国语言学研究心理学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关于词的学说可以看作是波铁布尼亚语言学思想的核心。他回答了思想一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他看来，人的认识从直接感觉开始，但仅凭直接感觉却可能限制与割裂思想，而词能使思想从直接感觉的不利影响下解脱出来，使思想完善化。词能帮助实现从形象到概念的升华。词是概念的符号。波铁布尼亚还强调要区别词的近义（ближайшее значение）与远义（дальнейшее значение）。只有近义才属于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远义则是其他学科专业研究的对象。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对正确处理与区别语文词典与专业词典的释义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此外，波铁布尼亚还论述了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的异同。词汇意义是实体的，而语法意义是形式的。前者对后者如同个别对一般一样。但使思想系统化的语法意义不是思想对象，它是从具体事物和具体思维行动中抽象出来的。与词汇意义相似，语法意义不同于逻辑形式意义，它与语法范畴都具有民族性。⁴读这些论述，不应忘记，这些话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说的。波铁布尼亚的许多观点，对俄国词汇研究相关学科的建立具有奠基作用，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国的词汇研究，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另一个在词汇研究中取得领先成就的研究者当推波克罗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М., 1869-1942）。他是莫斯科形式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连续发表了几篇论述词汇语义学（семасиология）的著述，致力于揭示词的语义变化的普遍性规律，与当时声称难以捕捉词义变化历史规律的某些西欧学者适成对照。波克罗夫斯基努力构建历史一比较语义学的理论基础。他特别着眼于属于同一概念范围的词汇，以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多种欧洲语言材料为实例，证明了不同语言语义变化具有的相同规律。他还强调指出，必须研究语义相关的一系列词、而不是孤立的个别词的语义变化历史，只有把某个词和与它相关的同义词，特别是属于同一个观念范围内的其他词一道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这个词的意义。这与后来提出的语义场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还结合词的形态与构词范畴，对动名词、形容词的意义变化规律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尤为可贵的是，他在着重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词义变化规律的同时，还注意到社会文化因素对词义变化的影响。从语言学思想发展更迭交替的角度来看，这是很有前瞻意义的。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维诺格拉多夫还认为，波克罗夫斯基的语义学方面的观察与总结仍然具有教益与意义。《语言学大百科词典》（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знание）把波铁布尼亚与波克罗夫斯基的著作，看作是对世界词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认为波克罗夫斯基开创了历史一比较语义学，并把词汇作为有系统的组织加以研究。这些评价是中肯的。

3 率先创立词汇学学科

俄国语言学教科书往往把词（слово）说成是人类语言的基本单位。这就为开展词汇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这一点与西方某些学者的意见形成鲜明的对照。如阿赫玛诺娃（Ахманова О. С.）所说，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一般只承认三类语言单位，这就是：音位（фонема）、词素（морфема）与结构（конструкция）。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说，词的问题是个伪问题，试图区分词素、词与词组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于是，词的问题就自然被排除在研究者视野之外了。美国描写语言学实际上往往用词素代替词的概念。到底应该如何给词下定义，特别是适用于不同语言中词的普适性定义，却一直是俄国语言学争论不休的话题。据统计，迄今为止，给出的定义不下二百多种，但没有一种是被普遍接受的，以至究竟能否给词下一个普适性的定义，这本身也成了一个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还形成了“怀疑派”与“可能派”，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是赫赫有名的语言学家。相比之下，美国学者如格利森（Gleason H.）在他的《语言学引论》一书中只把它一带而过，他认为，只有音位与词素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词素是与内容系统有联系的表达系统的单位，而词不过是“在一定结构中有固定顺序的几个词素”。

《语言学大百科词典》在“词汇学”（лексикология）条目中指出：“苏联的词汇研究，在继承俄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的同时，以各种不同语言为材料，取得了更大的拓展。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对俄语的深入研究，对苏联的多民族语言的科学研究，活跃的词典编纂活动，以及词汇学成为高等语文学教育体系必修的理论课程等多种原因。正是在苏联，词汇学成为了大学语言学的一门特别课程。”这段话不仅肯定了俄国与苏联的词汇研究优势，还概括解释了取得这种优势的原因。这里有必要提醒一句，只有当一门知识的研究积累与理论深度达到相当程度时，它才可能成为大学的一门独立课程。

在该词典的另一条目“苏联语言学”（совет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中，我们还可以读到：“我国语言学的总的走向决定了词汇学的大发展。所研究的有称名的基本原则，也有视不同语言类型而发生变异的词汇的组织原则。倾力探索构词学。熟语学则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熟语学与构词学理论领域，苏联语言学占有引领地位”。

上述说法会不会是俄国学者的自诩？为了解答这个疑问，需要寻找另外的证明。恰恰有一位名叫温瑞奇（Weinreich U.）的美国学者曾写道：“关于苏联的词汇学，对美国语言学家来说，最为惊疑的是，竟然还有这样一门学科存在。在西欧与美国语言学里并没有这样的学科。在《描写语言学导论》或《现代语言学教程》这类教科书中，词汇学连提也不提。谈到语言的词汇，作者仅限于几句即兴式的看法，而且连这一点也做得很不情愿。与此相反，在苏联的词汇学教材中，却辟出实际上与语法学与语音学等同的地位。”⁵

看来，俄国在词汇学研究方面的成绩与地位，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4 坚守词典学理论

词典学（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包括词典编纂的实践活动与理论两部分。说到词典编纂的实践活动，它本身就是对语言的词汇进行的最广泛、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活动，古代阿拉伯、中国直至西欧都有过堪称辉煌的成就。尽管俄国也是一个具有词典编纂传统的国家，但说到词典编纂实践，首先想到的还是上述其他国家。然而，如果说到词典学理论建设，那谁都不能不承认俄国学者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上个世纪40年代，正是苏联语言学家谢尔巴（Щерба Л. В.）率先提出了有关词典类型的理论，奠定了词典学的理论基础。较之后来颇有影响的捷克或法国等国家的词典学理论研究，俄国人的起步更早。后来，“在苏联，词典学变成了应用语言学的引领学科”。与此相反，不少西方国家的学者仍认为，词典编纂不过是一种“技艺”，而不是甚至也不可能是一

门“学问”。笔者曾撰写“lexicography 的两种不同定义”一文专门论及这一话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引介西方国家词典学理论著述的工作大大增强。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这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国外的新形势与新发展，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但不能不承认，西方学者对词典学是否是一门学科至今仍然存在争议。在 1983 年在英国举行的词典学国际会议上，德国的著名语言学家赫伯特（Herbert Ernst Wiegand）在发言的开头就明确表示，Lexicography 从来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大可能成为一门科学；Lexicography 也不是所谓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领域；Lexicography 也不是词汇学的一个领域。⁶

我们特意用“坚守”一词，是想突出俄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主张的明确性与一贯性。他们对词典学理论的开创之功，坚守之力，还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5 词汇学与词典编纂带动了其他相关学科

一般说来，俄国人在谈到跟词汇研究相关的学科时，以下学科都会被提到：如构词学、词汇学、语义学、称名学、词源学、词典学、熟语学等。词汇学与词典学前面已经说到，现在来说说熟语学（фразеология）。

熟语学是研究熟语的性质及其范畴特征，并揭示它们在言语中的使用功能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据说，在英国与美国语言学中并没有这样一个学科。⁷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也是上个世纪 40 年代首先在俄国问世的。那么，词汇研究是怎样与熟语研究搭界的呢？原来，词汇学研究的不仅是词，还包括与词的作用接近的词汇单位（лексическая единица），它们往往以固定词组的形式出现，广义的固定词组也可以包括熟语。按《语言学大百科词典》提供的情况，俄国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如波铁布尼亚、斯列兹涅夫斯基（Срезневский И.И.）、沙赫马托夫（Шахматов А. А.）、博杜恩·德·库尔特内（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эн И. А.）、福尔图纳托夫（Фортунагов Ф. Ф.），直到波利万诺夫（Поливанов Е. Д.）、维诺格拉多夫，都为熟语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过贡献。

接下来，不能不说到术语学（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在笔者看来，这理应是词典学的一个连体学科，更是专科词典编纂的支撑学科。按如今国际上新的说法，这个学科是上个世纪 30 年代由奥地利学者维斯特（Wüster E.）与俄国的洛特（Лотте Д.С.）、德列津（Дрезен Э. К.）几乎同时创建的。如今奥地利与俄罗斯也仍是世界上术语学研究领先的国家。俄国术语学研究的领衔学者认为，俄国在术语学理论研究方面“领先 15-20 年”。⁸当然，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在应用术语学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有差距。俄国人在谈到术语学在俄国的肇始与发展，总是与他们的词汇研究传统相联系，即使主张术语学今天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人，也承认最初它是从词汇学发端、衍生出来的。其实，术语本身也就是词或词组，它也是标准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它指称的是严格的专业概念，并且使用范围有一定的限制。

这样，由于词汇研究的带动，其他与词接近的词汇单位的研究也都“成了气候”。这些相关学科的相互支撑与相互促进，越发凸显了俄国语言学在词汇研究方面的总体优势。

6 众多著名语言学家实际参与词典编纂

《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的“俄国语言学”（языкознание в России）条目特别指出，把理论问题研究与词典编纂相结合是俄国语言学的传统。词汇研究与词典编纂的关系无疑是极为密切的。长期以来，通过词典编纂对词汇语言事实加以记录、整理与描写几乎是研究词汇的唯一形式。在词典编纂收集的丰富语料基础上，来阐释词汇的基本问题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完全合理的。重要的是，词汇研究者，不仅要借用词典编纂者的劳动成果，而且还要直接参与到这些工作中来，直接与无数形形色色的词汇事实打交道。许多俄国的语言学家正是这么做的。

沃斯托科夫(Востоков А. X.)是俄国最早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代表人物,他把历史比较法用于斯拉夫语的语音研究。凭此他可与历史比较法的代表人物,如德国的格里姆(Grimm J.)、丹麦的拉斯克(Rask R.)等齐名。他的词典编纂活动主要体现在,他花了20年主编四卷本的《教会斯拉夫语与俄语词典》(1847),以及两卷本的《教会斯拉夫语词典》(1858-1861)。斯列兹涅夫斯基作为19世纪的语文学家与民族志学家,却有40年致力于历史词典编纂的经历。沙赫马托夫作为彼得堡科学院的院士,有多方面建树的俄语语言学家,曾主编了科学院的《俄语词典》(1895-1916)。博杜恩德库尔特内是俄国喀山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与被视为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的索胥尔的思想交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他本人就曾主持过著名的达里(Даль В. И.)词典的修订。

进入苏联时期,不管是谢尔巴,还是维诺格拉多夫,不仅有重要的词典学理论建树,还有过大量的词典编纂实践。这类俄国学者的名字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大串。以其中的阿赫玛诺娃为例,至1957年她撰写《一般词汇学与俄语词汇学简论》一书时为止,她已经有15年的词典编纂经验。期间由她主编或参与编纂的词典共有20个版本。其中有英俄词典10个版本,俄英词典10个版本。而她的英俄词典编纂工作又是在斯米尔尼茨基(Смирницкий А. К.)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的。后者也撰有词汇学的经典著述《英语词汇学》。类似这样的师承关系,在俄国词典编纂活动中屡见不鲜。这有助于俄国的上述传统得以保持与发扬。

正是由于历代第一流的语言学家对词典编纂的实际参与,面对词典编纂中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以他们深厚的语言学功底,一旦着手研究,便会升华到相当的理论高度,再拿来解决实际问题,更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势,真的实现了词典理论与编纂实践的有机结合,并产生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7 致力于语言研究成果的词典化

以词典的形式把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展现出来,这种做法并不是哪个国家或那种语言特有的。但是,谈到俄国的词典编纂这个话题,这方面的情况还是值得拿来单独一说。

1924年,俄国有一部名为《语法词典》的工具书问世。书名虽然称为《语法词典》,但其实际内容却超出现在理解的语法范围。这实际上是一部通过诠释273个语言学学术语,全面介绍莫斯科形式语言学流派理论观点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以看作是俄国第一部语言学学术词典。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领域内术语研究与相关理论的关系,最能说明这种关系的一句话就是“没有术语就没有理论,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如果考虑到,这是术语学作为一个学科问世前近10年的事,以及此后在俄国有十多部同类词典的出版,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意义,也许会有更新的认识。顺便说说,迄今为止,最全面、最便捷地了解著名布拉格语言学派观点的著述,可能仍是集中了800个术语词条的《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词典》。

除去这种综合性反映语言学研究成果的百科性的词典,还应该提到反映某一较窄具体课题研究成果的词典,如反映阿普列相(Апресян Ю. Д.)的词汇语义研究的词典,依据梅尔丘克(Мельчук И. А.)的词汇函数理论创建的词典,卡拉乌洛夫(Караулов Ю. Н.)的词汇心理联想词典,等等。这类词典的编纂,首先,可能进一步扩大并普及某一理论研究的成果。一般说来,用作语言学某一理论观点实例的样本,数量不会很多,但如果要把它词典化,则需要大量与其研究结论相符的实际语料。这个过程本身,既是对原有研究结论的大范围的检验,也会进一步丰富、发展直至完善已有的研究结论。其次,对词典类型学研究来说,这也会起到推进作用。这类根据语言学研究成果设计出来的词典,往往是现有的词典分类谱系中所没有的新样型。

也许可以说,俄国学者之所以致力于语言研究成果的词典化,这本身也能体现本文前面提到的诸多方面特征的综合优势。

8 视规范性为语文词典的第一要旨

俄国人习惯称为“详解”(толковый)词典的词典类型,应该看作是词典的最基本的类型。这与我们所说的语文词典大致相对应,但语文词典译成俄语,首选的形容词可能是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或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英语里大致对应于“general”或“explanatory dictionary”。语文词典,特别是大型的语文词典,永远是一个国家或一种语言词典事业最高追求的充分体现。对英国来说,这类词典的代表是《牛津大词典》,对美国来说,应该是《韦伯斯特词典》,而对俄国来说,则是十七卷本的《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这些词典都堪称标志语文词典最高成就的丰碑。把它们拿来做一些横向的比较却会发现,它们之间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不完全一致的。

从1879年最早签订编写合同开始,到1928年最终完成为止,《牛津词典》追求的始终是“历史性原则”(on historical principles)。它面对解决的首要任务是呈现英语词的演变历程,同时,也追求记录下来最大数量的词。这既与英语内部的发展需求相联系,也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思想有关。当时正是历史比较法方兴之时,此前曾盛行的“规定性”的原则,已经被描写性的、历史性的原则所替代。而对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韦伯斯特词典》来说,它第一侧重的是反映英语在英伦三岛以外的美国、直至加拿大等地区的意义与用法。这也反映在不同版本词典的名称上,往往少不了“美国”(American)、“国际”(international)等字样。而俄国的语文词典,从乌沙阔夫(Ушаков Д. Н.)的《俄语详解词典》到四卷本的《俄语词典》与奥热果夫(Ожегов С. М.)词典,都首先声称是属于“规范性”的。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体现苏维埃时代形成的俄语标准语的规范”。最有意思的是十七卷本的俄语词典,最初本来定位在“不仅是详解—历史性的,也是规范性的”,但是,到后来,规范性原则被提升到了第一位,而历史性原则却受到了挤压。最终,这部词典编成了一部“带有历史成分的规范—修辞词典”,“规范性原则臣服了对语言历史的关注”。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十七卷词典的收词量仅为12万,不仅远逊于《牛津词典》或《韦伯斯特词典》或法语的大罗贝尔词典,甚至比俄语自己的达里词典(收词20万)也少。在决定什么词收什么词不收的问题时,编者首先要用规范与否来衡量与筛选。

即使粗略地比较一下苏联和西方国家出版的词典的具体条目,也不难发现一些明显的不同。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在这些(指西方)国家出版的词典中,通常选收大量的口语和俚语词汇,包括与两性关系、排泄现象以及麻醉药品有关的词汇,一些时间性很强的新词,也大量选收了”。⁹这不仅表现在收词,也体现在释义上。西方的词典,如韦伯斯特词典,不仅选收了大量的专有名词,而且在许多普通词的释义中,也提供了不少百科性的内容。如《韦氏新国际词典》(第三版)中,对hotel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一个包括许多房间的建筑物,主要为过客过夜提供便利的措施,有带电梯设施的几层楼,通常有一个与街道一般水平的摆有安乐椅的门廊,有各种分隔间,可作吃、喝、跳舞、展览和小组会议(如店员、大会服务员的会议)之用,有向内开的和向街道开门的商店,供应旅行者特别感兴趣的商品(如衣服、礼物、糖果、戏票、旅游票),或提供个人服务(如理发、擦鞋),有可自由使用的公用电话间、写字台、盥洗室。”这样的释义方法俄国的词典是不可能接受的。相反,对许多不同类型的词,俄语词典都有相对固定的释义模式。由于词典本身带有规范性质,连这些释义模式也具有了某种规范性。如果其他俄语词典沿袭这些释义模式,那是不会受到责怪的。

9 积极务实地面对语言的新变化

苏联解体以及随后发生的国家的“转制”,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极大改变甚至震荡,加上当今信息化时代与国际环境的特点,近年来俄语所发生的变化,尤其体现在词汇方面,是巨大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难以适从的。有人把这种变化与彼得大帝的改革、十月革命的爆发对语言造成的影响相提并论。俄国学者在描述这些变化时,常用的词是“雪崩似的”、“失

控的”之类。

面对如此重大的语言变化，俄国的词典编者表现出的应对态度，应该说是积极务实的，又是严肃清醒的。1998年，由俄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编写的《20世纪末俄语语言变化详解词典》问世。如该书简介中所说，“该词典描写的是动态的语言过程，传统上它们只能置身于某些科学院词典之外，其中也包括最新一版的奥热果夫词典”。从中不难看出，该词典是具有突破与创新意义的。它的宗旨就在于“展示1985至1997年12年间，在经济、社会、政治与心理大变动时期，处在社会生活发生转折时的俄语发生的变化。”编者在引言中指出，他们对语言中词汇系统存在的稳定性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们更知道，在语言进化的不同阶段，词汇系统的稳定性是不同的。近十多年来俄语词汇系统呈现出很低的稳定性。接着，编者列举了各种重大语言变化情况，如雪崩似的构词；失控的外来语洪流；低俗词语侵入一般语言；表示时代新概念的词语极为活跃；社会主义时代某些词汇整词层地退出使用；等等。编者基于语言学的理论，对这些语言现象所发生的原因，做了相当深入的解析。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如何借助词典，即通过处于静态的词条来展示词的动态变化，应该说，这本身就是词典编纂的一个重大技术问题。笔者特别欣赏编者所采用的各种注释符号。如用一只手 \sphericalangle 表示首次进入词典的词或词义，而用两只手 $\sphericalangle\sphericalangle$ 代表曾收入其他词典，因而只是相对的新词或新义；用指向不同的箭头（如 \curvearrowright 、 \emptyset 、 \oplus ），分别表示一个词或意义，或由“弃用”转成“重新启用”；或由消极转成积极；或退出积极转为消极；或用一本书 \square ，显示取自书面的例证，以区别于来自活的言语的实例；如此等等。这些符号既形象、直观，又生动活泼，为动态地展示词的变化，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处于“冷战”时期的苏联，对低俗词语的研究著述，甚至是保密的，连读者对象都是严加控制的。这类词典的编纂更是一片空白。那时，只有在敌对的西方国家，才会出版这类记录俄语中低俗词语的词典，那可能被视为配合“反苏”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如今，面对活生生的语言现实，眼见大量的俚语、俗语、黑话、骂人话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不时出现于电视、书刊等各种媒体之上，敏感的语言学家自然会深有感触，自然会作许多理性的思考。惯于强调规范的他们，也许还要做出一些“超越自我”的行动。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不同版本的大部头的此类工具书，及时跟进出版。笔者所在单位的书架上，能找到的就有四、五部之多。¹⁰如其中“致读者”或“前言”中所说，这类词典收入的词语，既有罪犯、盗贼、骗子的黑话暗语，也有政治犯、警察、海员、大学生之间的行业俚俗语。这些词语历来被语言纯净论者看作是“词语垃圾”，是必须从健康的、唯一正确的标准语土壤中连根拔除的。但编者认为，却正是这些俄语的低俗语言，避免了让标准语沦为僵死的官腔语言，并冲破各种禁忌，持续地使现代俄语向前发展并充满活力。当然，并不是所有这类词语，都有生命力，更不要说富有美感。其中确有不少污秽、粗俗与野蛮。但编者清醒地意识到，此类词语大行其道，往往发生在革命、暴乱、大变动等社会震荡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泥会沉淀，被搅浑的浊水会澄清，并汇入浩荡的巨流之中。而富有活力的自由，总是语言系统中起净化作用的清流。为了理解这个过程，必须对当代语言洪流中的所有组成成分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没有这些知识，也许可悲，也许可幸，就不可能阅读当今出版的书籍与期刊、听广播、看电视、上网、或者收看国家杜马的政治辩论，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这个国家不同辈分、不同社会与行业群体的代表人物。

编者的上述认识，也许能帮助读者理解编写这类词典的必要性。接下来，有心的读者与词典专家还会发现，编者对一系列词典编纂的技术性问题的处理，是非常严肃认真，非常在行，甚至是值得称道的。比如，词典里的全部语料都有据可查，且都取自1997至2005年期间的文学作品、科普读物、以及中央或地方的报纸。这对消除读者阅读时可能产生的某些疑问非常必要。正是考虑到这类词语的特点，词典的释义对象单位往往不是整个词，而是单独

的词义。各类修辞标注也比通常词典的同类标注区分更细。不难理解，这些做法对这类词典，是非常必要而合理的。读者也许会感叹，面对这些也许格调低下的“污言秽语”，编者的态度却是勇敢、严谨而求实的，他们付出的劳动是有专业水平的，令人敬佩的。

与低俗化倾向似乎相对的另一语言变化，可以称为语言的“科学化”倾向，这是指称新概念的科技术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力度，大量涌入日常语言。此前已经有人指出，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日趋接近，是当代语言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势。只是这一时期，这种趋势表现得太突出了。词典编纂对此的应对，一是在语文词典中，大量收入了术语词汇。二是强化了外来语词典的编纂。笔者手头的两部外来语词典的前言中指出，词典收入的 2, 5 万多个词或词组，不仅广泛使用于不同社会生活范围，包括科学、技术、政治、艺术、宗教、体育，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能经常遇到。¹¹因此，编者致力于“系统”、“充分”地展示俄语词汇中的外来词。为此，收词的来源、范围与数量都扩大了。除去主要来自英语等印欧语言的词之外，来自阿拉伯语、突厥语以至东方语言的外来语，都进入所收范围。原属苏联的独联体国家的语言也开始被看作是外来语。与此同时，编者仍不忘声明，并不是所有见诸于言语中的外来词都有资格进入词典，那些转瞬即逝的偶发词并不被看好，全而不滥仍被看作是一个收词原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编者一改以往外来语词典编纂的一些作法，不仅仅注明词义、词源等信息，还引入了通常详解词典才采用的一些手段，例如提供许多反映使用上下文、修辞色彩等细微方面的例证，指出进入俄语的途径，同时还辅以插图、照片，以及许多有用的百科信息。这显然是考虑到这类词的异域性与科技性而采取的技术性措施。这些作法对外来语词典的编写具有突破意义，对读者更好地理解与使用外来语，也有实用价值。

10 理性地坚持固有传统

在上述语境下重新修订出版的大科学院词典（即原十七卷词典的新版，已经出版十卷）会向何处去？这自然是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我们还是看看词典的编者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词典的前言中写到：词典收入 15 万个（原来是 12 万个）古典（19 世纪）与新时期（20-21 世纪）的俄语词。大科学院词典是规范性词典。标准语的规范是指，优秀的文学典范作品与社会上有教养的那部分人选定的、反映语言发展规律的、相对稳定的表达方式。作为一部规范性词典，大科学院词典是语言传统的保存者，同时也要摆脱阻碍语言发展的、凭空臆想的教条，因此词典应该对俄语中正在发生的客观进程给予解释。自 18 世纪以来，在俄国的词典编纂史上，多卷本的科学词典已经逐渐形成为一种特别的类型。新版的科学院词典正是谢尔巴在更广阔的语境下谈到的这类科学院词典的代表。但是，时代在前进，语言也好，规范也好，词语的语体色彩也好，都在不断地、悄悄地变化着。成千上万的新词语进入使用，语法形式与读音、重音规范也都在被重新衡量。特别是 20 世纪末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对语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词典来说，“新”这个概念在理论上并没有深入研究。但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词典编纂里的“新”与文艺作品里的“新”，是有根本区别的。任何一部新编的词典中不可能什么都是新的。这样的词典不可能被人读懂与使用。每一部新词典，特别是现代语言的详解词典，都与词典编纂的历史与传统，有着最紧密的联系。首先，说到现代俄语词典的词目，在当今各种各样大小词典、语料库、电子词典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实在难说，某个词是否在什么地方已经入典。至于说到罕见词，这正是科学院词典的长处，这样的词在科学院词典里都提供用法的实例。把每个新出现的新词一定都加以记录，这绝不是科学院词典的追求。科学院词典的任务在于着重描写已经经历过一定社会化阶段并获得足够程度流行的那些词。科学院词典的作法，以反复权衡及某种健全的保守为特征。其次，各类词典重复的是客观的语法特征，而对有争议的情况是应该加以回避的。

不过，新的大科学院词典绝不是十七卷词典的摹本。原词典所收的许多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语录，已经剔除。对不久前存在但今天已经退出历史的现象与概念，对类似布尔什维克、

克格勃、共产主义等词语，词典或注明“苏联时期”，或从现代民主立场考虑加以解释。

这部词典不仅是规范性词典的宝贵出版物，也是阅读 19、20 世纪文学作品的独一无二的参考书，它会扩大读者的智力视野，提升他的言语文化修养。

大科学院词典创造了一种新的现代俄语的科学院词典的类型。它涵盖很久的历史时期，比此前的任何科学院词典涵盖的时间跨度都要长。因此，它是 19 至 21 世纪俄语词汇独一无二的宝库。它不仅是一部标准语词典，它还包括了当代日常与专业词汇的广大词层。它以高度规范性为特点。它开创了现代俄语详解词典编纂的宏伟的新时期。今后，不管是任何新的俄语词典，不管是 19 世纪俄语词典，还是反映现代俄语词汇变化的词典，都不会不考虑大科学院词典的成就。它开创了现代俄语详解词典编纂史上的一个宏伟的时代，同时也为思考 21 世纪科学院词典的前程开辟了新的道路。编者们的指望，他们已经得以反映语言词汇中发生的变化，也指望，作为一部规范词典，将会有助于合乎目的的、有科学依据的语言政策的贯彻实施。

编者们的这些想法不管是否能得到俄国语言学界的普遍赞同，其分量终归还是很重的，其思想内涵也值得仔细玩味。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粗略地描述了俄国词典编纂活动中值得关注的主要方面。这些方面归纳起来是：可以算是悠久的词典编纂历史；词汇语义研究的先行者；率先创立词汇学学科；坚守词典学理论；词汇学与词典编纂带动了其他相关学科；众多著名语言学家实际参与词典编纂；致力于语言研究成果的词典化；视规范性为语文词典的第一要旨；积极务实地面对语言的新变化；理性地坚持固有传统。

同为词典编者，我们第一位要做的，也许是了解国外同行的认识与想法，而且这是很值得尊敬的同行。至于同意还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与作法，我们不妨在深入的思考之后，再作恰当的评判。

附注

1 Козырев В. А. Черняк В. Д. Вселенная в алфавитном порядк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 РППУ, 2000, стр.14.

2 罗宾斯 R. H. 原著, 许德宝等译, 《简明语言学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第 187 页。

3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и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8, стр.182.

4 柯杜霍夫, 《普通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7, 第 59-64 页。

5 转引自 Березин Ф. 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8. стр. 233.

6 转引自网上资料: Wiegand H.E., On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s of a General Theory of Lexicography// Proceedings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xicography.- Exeter 9-12 September, 1983, p 13-20..

7 Березин Ф. 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8, стр. 233.

8 Гринев С. В., Лейчик В. М.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Москва, 1999, No7.1.

9 罗伯特 伯奇菲尔德, 《词典编纂学》, 商务印书馆, 1980, 第 9 页。

10 这几部词典分别是: Большо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жаргон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ОРИНТ 2001. Большой словарь молодёжного сленга. Москва, 2003.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ненормативной лексик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Астрель –Аст, 2003.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чала XX I века актуальная лексика.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6.

11 这两部词典分别是: Н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лов. Москва: Азбуковник, 2003.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ы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лов.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8.

参考文献

- [1]Березин Ф. М. 1988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M].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 [2]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1978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и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M].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 [3]Гринев С. В., Лейчик В. М. 1999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J].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Москва, № 7.
- [4]Дурново Н. Н. 2001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 [5]Козырев В. А., Черняк В. Д. 2000 Вселенная в алфавитном порядке[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 РППУ.
- [6]Сороколетов Ф. П. 1998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 [7]Ступин Л. П. 1985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M].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 [8]柯杜霍夫 1987 普通语言学[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9]罗伯特·伯奇菲尔德 1980 词典编纂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0]罗宾斯 R. H. 1997 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等译)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1]郑述谱 2005 词典·词汇·术语[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12]郑述谱 2009 词汇研究——俄国语言学的亮点[J], 外语学刊, 第 5 期。

Tradition and Novel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Lexicography

ZHENG Shu-pu

(Centre for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a summary description of the aspects that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in the history and the state-of-the-art of the Russian lexicography. These aspec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good trad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lexicography; forerunner of the lexical semantic studies; taking the lead in establishing the discipline of lexicology; sticking to its own lexicographic theory; lexicology and lexicography motivates the studies of the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 many noted linguists actually involve in the work of lexicography; to be engaged in applying the linguistic research results to the lexicographic products; regarding the prescriptiveness as the essentials of the language dictionary; highly pragmatic to the new linguistic changes and rationally adhering to its own tradition.

Key words: Russia; lexicography; tradition; novelty;

收稿日期: 2010-03-27

作者简介: 郑述谱(1940-)男, 山东牟平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词汇学、词典学、术语学。

[责任编辑: 张春新]